



## “重瓣花朵”与“多元一体”

吴春明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考古学文化是特定时空民族或族群共同体的物化遗存,是观察、研究史前与古代族群时空关系的最重要手段,民族史、文化史的探索是考古学研究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在近百年中国学术史上,考古学对于新史学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通过史前、上古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梳理,重构中华民族起源与形成的早期历史,重构中国民族史的基础框架。从严文明先生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结构的描绘,到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集中体现了考古学对于中国民族史、文化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 一、从“区系类型”到“重瓣花朵”

我国的考古学是西方近代考古学“西学东渐”的产物,考古学方法的“中国化”,成为以汉文史籍为据的传统史学之外,重建中国历史、尤其是史前史与上古史之新史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考古学成为真正新史学的进程中,苏秉琦先生成功实践并不断发展了蒙特柳斯的类型学方法,找到了通过考古类型学——即器物、器物群与文化、系统性区域关系等多层次的谱系关系,研究、认识中国史前、上古民族文化空间关系与发展演变的有效途径。

苏秉琦先生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这一从考古发现到古史重建的“途径”。这一方法肇始于他的斗鸡台陶鬲研究,但从考古学上试图建构中国史前文化框架的代表作是1981年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他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即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

区。“六大区系”主要是针对史前文化多样性的认识,是古文化空间分布上块块、条条,“在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这里,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可见,“六大区系”着眼的古文化的空间关系主要是“条条”的关系、“分支”的关系,但却没有“块块”关系的分析与理论总结。这里暂且不论“六大区系”的“块块”划分是否符合史前文化的实际,对于重建中国古史的全局而言,“块块”的关系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块块”的空间关系模式,那么对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认识就只有静态的空间布局,就无法展示多样的史前文化进程并走向统一的早期文明的潜力、方向与动力。而严文明先生1987年提出的“重瓣花朵”与张光直先生1989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就是考古学界应对“块块”互动与关系的两种代表性的探索。

张先生的“中国相互作用圈或中国以前相互作用圈”理论发展了苏先生“六大区系”的论述,不仅描述了红山、小珠山、仰韶、大汶口、大溪、山背、马家浜、河姆渡、石峡—昙石山—凤鼻头八个不同文化系统的存在,而且看到了这些空间文化系统之间因非常密切的关系即“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圈子”,这个区别于圈外的“史前的圈子”成为历史时期“中国”的基础。“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几个区域性的文化相互连锁成为一个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诚然,“相互作用圈”的理论把分散的“块块”统一起来了,肯定

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具有史前文化“统一”的基础。但在这一“史前的圈子”中,圈内各文化系统间被看成一种平等、等序的空间关系,并把这种等序的“相互作用”作为文明起源的动力之一;“外面的作用网和两千年间在内部所发生的变化,在这个区域史到公元前第三千纪之末之准备向国家、城市和文明跨进的准备工作上都是同等重要的。”

严先生的中国史前文化“重瓣花朵”结构的理论总结,则提出了史前文化空间关系的不平等的差序格局,即“中国史前文化是一种分层次的向心结构”。具体讲,“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史前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又处于核心的位置”、“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江浙五个文化区是“第二层次”的“花瓣”,层石山、大窑坑、石峡、白羊村、卡若、昂昂溪等是“第三层次”,是“第二重的花瓣”。在这种“统一”与“多样”共存的关系中,统一性是建立在史前文化多层次的多元“花瓣”的基础上,多样性寓于以中原为“花心”、“核心位置”的“向心结构”中。这显然是与苏先生六大区系的“块块”分布、张先生“史前的圈子”内各个文化系统平等的“相互作用”完全不同的空间关系格局,不同在于差序格局所确立的具有不同的疏密、远近关系的不平等的文化关系,在于与“花心”“花瓣”自然结构类似的同心圆的有序形态。

“重瓣花朵”不仅仅钩沉出了中国史前文化多元形态中不平等的、差序的空间关系格局,还“与古史传说中的各部落集团的活动区域相联系,实际上是一种民族文化区的萌芽”,即中原文化区“是黄帝和炎帝为代表的部落集团的地域,以后在这里形成华夏各族”,甘青为“羌戎各自的史前文化”、山东是“东夷诸族的史前文化”、燕辽是“燕文化”的重要渊源、长江中游为“三苗”、“楚文化”孕育区、江浙是“古越族的史前文化”。这一论述,让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旗帜鲜明地回归历史研究、古史重建最基础部分的民族史探索的本职。

可见,“重瓣花朵”超越了单纯的时空布局分析,而构建了不同时空文化以中原为核心的疏密、远近程度不同的差序关系格局,精辟地概括了中国

史前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共存的紧密的内在结构。这一同心圆式的差序结构,不仅克服了文化史、文明起源研究上争论不休的“一元论”与“多元论”的偏颇,而且具有因中心的引领与带动、周边的激荡与影响而产生的空间动力学、因同心圆式的向心结构所提供的超稳定性。这一动力是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的重要原因,“这一发展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及其特点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一超稳定性是中国文明延续不断的重要原因,“这种格局把统一性和多样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产生出强大的凝聚力量”。所以,“重瓣花朵”是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界提出的一系列宏观的区系、谱系理论中,对中国史前文化发展脉络最清晰的梳理,成为考古学视野下重建中国古史、认识中国文化内在结构的基础性文献。

## 二、从“重瓣花朵”到“多元一体”

在进入王朝政治之后的四千年的文明史上,区域文化的空间关系、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从来就不是平等的、等序的关系,而是表现为强烈的“中国(王朝)与四方”、“中心与边缘”的差序关系。历史上“四方”曾经相继“逐鹿中原”,边缘族群曾经先后入主“中国”,但从未改变文化与空间上的“中国—四方”、“中心—边缘”的差序格局。显然,“重瓣花朵”的差序结构揭示了中国古代文明这一内在结构的直接基础,“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鲜明特色”,这一理论在历史学界、民族学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89年,费孝通先生发表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史前考古、历史文化与民族关系的角度,在时空两个坐标上,从空间到人文、从历史到现实、从中原到边疆、从华夏汉族到非汉族群、从分裂迁徙到统一融合,系统阐述了中国历史上以中原汉人为核心凝聚起来的多元文化一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内在特点。“回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多元一体格局存在着一个凝聚的核心。它

在文明曙光时期,即从新石器时期发展到青铜器时期,已经在黄河中游形成它的前身华夏族团。”“汉继秦业,在多元的基础上统一成为汉族。”“组成中华民族的成员是众多的,所以说它是个多元的结构。”“这是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是新史学在中国文化史、民族史上最重要的理论框架,迄今仍是认识中国历史、民族、文化的精要的经典文献。

“多元一体”理论的构建,正是吸收了考古学界对于中国早期古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探索成果。在费老“多元一体”理论出炉之前,严先生在“重瓣花朵”中对中国的民族文化格局是这样表述的:“现代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并结合着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统一的各民族国家。这样一个既有主体、又有众多兄弟,既是统一的、又保持各民族特色的社会格局,乃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它的根基深植于遥远的史前时期。”道出了“主体”与“众多”统一的中心思想,而这一思想正是“多元一体”前四节“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多元的起源”、“新石器文化多元交融和汇集”、“凝聚核心汉族的出现”所强调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特征。费老在文中坦承,“由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我们才有条件对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做出比较科学的认识”,“新石器时代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点”。

比如,“多元一体”以“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开篇,费老强调两点,即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与自西向东倾斜的三级阶梯对“一体”与“多元”的制约。“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他们所聚居的这片大地是一块从西向东倾倒的斜坡,高度逐级下降。”“东西落差如此显著的三级梯阶,南北跨度又达30个纬度,温度和湿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给人文发展以严峻的桎梏和丰润的机会。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个自然框架里形成的。”这正是严先生“重瓣花朵”第一节所强调的两点。

在“多元的起源”一节中,费老强调了“多元论”

和“本土说”及“多元一体格局的起点”。“过去长期存在着多元论和一元论、本土说和外来说的争论”,“(旧石器)实物证据可以否定有关中华民族起源的一元论和外来说,而肯定多元论和本土说。”“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已存在了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点。”这里所指的“实物证据”是指各地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猿人、古人、新人化石及其石器文化。这一点上,严先生在“重瓣花朵”中,对旧石器时代多元文化谱系有更深刻的总结,即旧石器时代华北文化的两个系统(匱河—丁村系、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和华南文化的两群(东南、西南)为代表的多样性,石片石器、单面加工、刮削器和尖状器为主的三个共同特点为代表的统一性,应更具考古的专业深度。

在“新石器文化多元交融和汇集”和“凝聚核心汉族的出现”两节中,费老阐述了若干文化区组成的“多元”和华夏、汉族“凝聚核心”的“一体”共存的格局。在前节明确否认“一元论”的基础上,费老将“中原两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划分为黄河中游以“中原地区为中心”、黄河下游、长江下游、长江中游、燕辽、黄河上游、华南等八个文化区,这与严先生在“重瓣花朵”的划分是一致的。“新石器时代中原两河流域中下游这个在生态条件上基本一致的地区,的考古发现,已可以说明中华民族的先人在文明曙光时期,公元前5000年到前2000年之间的3000年中还是分散聚居在各地区,分别创造他们具有特色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格局中多元的起点。”

费老主张在多元格局中因“文化交流”与“凝聚核心”而形成“一体”格局。“当时各族团间文化交流的过程,从多元之上增加了一体的格局。”“夏商周三代正是汉族前身华夏这个民族集团从多元形成一体的历史过程”,“华夏文化就是以黄河中下游不同文化的结合而开始的。”“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这只是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又一步。第一步是华夏族团的形成,第二步是汉族的形成,也可以说是从华夏核心扩大而成汉

族核心。”

主张在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华夏、汉族是多元文化的“凝聚核心”，这正是严先生“重瓣花朵”理论的中心思想。严先生在文章最后的一段话总结了“重瓣花朵”的“向心结构”与华夏、汉族凝聚核心的关系：“中国史前文化已形成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自然地发展为以华夏族为主体，同周围许多民族、部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度关系的政治格局，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这种格局把统一性和多样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产生出强大的凝聚力量。”

总之，严文明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重瓣花朵”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史前文化面向中原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完整结构，既区分了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与文化系统的差别，更准确地把握了不同系统在史前文化整体格局中的不同地位，即以中原为凝聚核心的同心圆式的差序格局，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体系中“中国—四方”、“中心—边缘”的关系格局的基础。“重瓣花朵”跳出了“为区系而区系”的教条式区系类型研究，是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中最贴近古史重建目标的成功实践，并直接贡献于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彰显了考古学在重建中国民族史、文化史上的新史学价值。

2010年7月18日初稿于福建武夷山市赤石渡头岗遗址发掘工地，应韩建业教授之约提交“严文明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2012年9月29日凌晨改定于波士顿布鲁克莱恩寓所。

注释：

我的理解，历史与文化是人群、族群创造的，在多元、多样的中国文化史上，历史研究、文明起源探索首先要搞清楚也应是创造的主体——人群、族群，而不是直接冠以“中国”而含糊以概之。

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a.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b.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9年。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费老的“参考书目”中列举了著名民族史学家、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陈连开教授的《关于中华民族的含义和起源的初步研究》（《民族论坛》1987年3期，以下简称“起源”）、《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及其汇聚与辐射》（《北方民族》1988年1期）两篇（后篇只是在前篇基础上的补充与修改），但没有提到严先生的“重瓣花朵”一文。其实，费老的“多元一体”就是由陈连开教授协助编纂完成的（见《陈连开教授生平》，中央民族大学 <http://www.myzx.muc.edu.cn/plus/view.php?aid=763>）。审读费、陈、严三稿不难发现，三者对于中国史前文化多元、多样基础上的以中原为凝聚核心的统一体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陈文中还有不少具体的论述与严先生的“重瓣花朵”相似。可见，陈先生作为一位民族史学家，应是吸收严先生的研究成果。正是通过陈先生的吸收与协助费老编纂“多元一体”，使得以严先生的“重瓣花朵”为代表的考古学界关于中国史前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理论及时地反映在费老的“多元一体”这一中国民族史、文化史鸿篇巨著中，这是一段重要而有趣的学术史。

在费老参考的陈先生“起源”一文中，这一部分的很多具体描述都与严文相似：如“中华大地第一个地理特点是四周都有天然阻隔，内部构成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其西北临帕米尔高原，虽有一线可通，秦汉以后形成丝绸之路，然而这巨大而高寒之区，在整个古代仍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地理极限。”“如此差落显著的三大阶梯，像把巨大无比的大躺椅，西北背靠亚欧大陆，东南面朝太平洋和印度洋。”“秦岭—淮河以南，是以稻作农业为代表的水田农业和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民族分布之区；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以东以南是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区，也是华夏—汉民族首先发展的地区；秦长城以西以北是草原游牧区和狩猎渔猎区，是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分布与发展区域。”

陈先生在“起源”之“中华远古人类及其文化证明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华大地”一节中，对旧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化石人类和文化有更详细的罗列，但没有吸收考古界关于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南、北差异四个系列的谱系关系的论述，应是民族学者与考古学者在专业认知上的差距。

关于新石器时代多元文化以中原为核心的看法，陈先生在“起源”中说：“中华文明首先在黄河中下游发达”，“以黄河中下游两大新石器文化圈为主源，同时汇聚了诸多新石器文化熔铸出来的结晶。中华新石器文化多源区域性发展有如星火点点，又源源汇聚于中原，成为熊熊篝火。”

（责任编辑：周广明）